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

蒋承勇

(浙江工商大学 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演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人的道德观念迷失催生了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自然科学思维的浸润催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对人性理解的深化与拓展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灵魂描写的真实性与深刻性。社会批判性、真实性及深度人性抒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本质性特征,也是这种文学文本“经典性”的要素呈现。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真实而深度的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展示了上帝缺位、金钱主宰的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千姿百态,描写了金钱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的破坏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发出了警告:物欲诱发的贪婪,将把人送入地狱——“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他们的创作也普遍成了至今依然拥有深刻警世意义的“文学经典”。

关键词: 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社会批判性;真实性;人性抒写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8)01-0005-07

DOI: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8.01.001

The Generation of 19th Century Realism Literary Classics

JIANG Cheng-yong

(*Institute of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loss of human morality have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social-critical realism literature. The infilt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 thinking catalyzes the realistic spirit of realism literature. The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strengthens the authenticity and profundity of the depiction of human soul in realism literature. Social criticism, authenticity and profound description of humanity are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19th century realism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classic” elements of these literary texts. 19th century realism writers show the diversity of human mind in the society of God’s absence and money worship, and describe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human “evil” aroused by money with the real and deep social observation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creations, they warned the people of that day and even today: the greed that is induced by materialism will send human into hell—“they are the hell of their own.” Their creations have widely become

收稿日期: 2017-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10ZD135)

作者简介: 蒋承勇,男,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literary classics” that still hold a profound warn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realism; literary classics; social criticism; authenticity; description of humanity

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标志着近代欧美文学的繁荣,它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文学思潮。社会批判性、真实性及深度人性抒写,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标志性本质特征,也是这种文学文本“经典性”的要素呈现。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透过社会和文化的表层,寻找“人类永恒的破坏或创造之力”,开掘“来源于人类之天性和人类共有的心理及玄学之本原”^[1],正是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现实主义文学在深层文化内涵上到达了空前的深度、广度与高度,从而拥有了恒久的经典之魅力。

—

现实主义文学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产物。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从此,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1832年英国实行了议会改革,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两大政治事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英、法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相继经历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文学,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的关键性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态的剧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后,欧洲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封建时代,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都有自己应该感到满足的固定位置,每个人的地位与价值似乎一生下来就已被确定好了,无需做出个人的努力。爱上帝、爱邻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教伦理观念使人与人之间不无脉脉温情。在社会经济上,行会制度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人们参与商品交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为了积聚财富,否则是要受道德谴责的。因此,在封建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相对处于贫困状态,但人们却有一种满足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资本主义的出现,传统的社会关系破坏了,个人从各种封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商品经济激活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物欲意识,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毫无道德限度,就像资本家对工人剥削一样”^{[2]184}。在强烈的竞争观念支配下,物欲的无限膨胀使人们想尽办法超过他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成功而奋斗,因而,“人不再是自身的目的,人成了他人的工具”;“人被人所利用,表现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价值体系”^{[2]93}。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群体关系恶化,个人从家长式的专制及等级制度中‘摆脱’出来,却付出了放弃群体联系这个代价。人们的相互关系失去了道德义务感和情感特征,从而变得靠单一的经济利益来维持。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基于物质利益”^[3]。

因此,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方面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它给人带来了一定程度自由、解放和物质的富裕,而另一方面又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新的文明给人带来了新的束缚,尤其是物对人的束缚,使人的自由得而复失。财富的创造提升了人对财富的占有欲和支配欲,“自由竞争”原则为人与人之间“搏斗”戴上了合理的道德光环,于是,“万物之灵的人类终于悟出了他的兽性;这个兽性原来就是物质‘文明’的所赖”^[4]。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对自身的处境、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也不断深化。现实告诉人们:启蒙主义者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存在,他们描绘的“理性王国”只不过是肥皂泡而已;浪漫主义者那脱离现实的“理想”也不过是画饼充饥。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现实社会并思考人的命运,从更现实的角度去寻求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方法。于是,讲究务实,追求客观冷静地分析与解剖现实的社会心理和风气随之形成。正是在

这种心理和风气的影响下,一种批判性、写实性与很强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而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兴盛,则进一步催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

二

自文艺复兴起,欧洲人就开始借助科学的力量抨击教会和宗教,展开了对上帝的不停的排斥,到了科学空前繁荣的19世纪,人更自信自傲了,人对上帝也失望了。科学导致了西方文明史上人文观念的根本性转折,也导致了西方文学对人性理解与表现上的根本性变化。也正是由于科学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影响,致使其人文观念与人性抒写上拥有了承先启后的特征。

浪漫主义从卢梭的感性主义那里获取灵感与精神养分,发展壮大之后又在整体上构成了与启蒙哲学的反叛。然而,启蒙哲学最主要的精神是张扬理性、崇尚科学,卢梭本人也是不排斥理性的,理性毕竟是18世纪的最强音。而且,理性与科学几乎在18世纪摧毁了宗教世界观之后,高视阔步地走向了19世纪。因此,尽管浪漫主义不无先见地预感到了人偏于理性与科学的不良后果,但是,由于理性本身所拥有的人文性,启蒙运动也进一步昭示了这种人文性,人们对它的崇尚无疑有增无减。在这种理性精神鼓舞下,19世纪的科学取得了比18世纪更辉煌的成就;或者说,18世纪的理性启蒙之花,在19世纪结出了科学的丰硕之果。“同以往所有时期相比,1830到1914年这段时期,标志着科学发展的顶峰”^[5]。而且,科学与技术相结合加速了财富的创造,给人们带来了生存实惠。所以,科学成了人们心目中给人以力量的新的上帝,理性也自然被认为是人之为人、人之高贵强大的本质属性。较之18世纪,19世纪对理性的崇拜有增而无减,甚至达到了“理性崇拜”的地步。科学史家曾经为我们描绘过19世纪人类科学与理性的壮美图画:

19世纪的最初25年,此时以工业革命为转机,人类社会已经天光大亮了。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与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相伴随的经济危机,开始周期袭来。在打破了过去僵化的世界观之后,科学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19世纪建设科学文明的篇章就由此展开……从而出现了科学的黄金时代。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诞生,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电报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铁为原料、以煤为动力的大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像一发巨型炮弹炸开,把进化思想带进了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社会以及其它一切领域。19世纪下半叶,近代欧洲的政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8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是近代史上一个转折时期,卡特尔和托拉斯全面发展。革命性的动力——电能的出现和应用,电动力开始代替蒸汽动力,这是生产中的革命变革。与此同时,19世纪的风格是,科学家——工程师——商人,而不是17、18世纪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的风格了^[6]。

这幅19世纪的科学图画告诉我们:在西方人的文化观念中,19世纪是一个科学取代上帝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崇拜的时代,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了高峰的时代。此时,人们更坚定了三个信念: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凭借科学与理性可以把握自然的规律与世界的秩序;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对科学的崇拜,使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不仅仅限于科学本身,而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切问题。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曾指出:

在19世纪的上半期,科学就已经开始影响人类的其他活动与哲学了。排除情感的科学研究方法,把观察、逻辑推理与实验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科学方法,在其他学科中,也极合用。到19世纪的中叶,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趋势^[7]。

科学的这种影响在19世纪的欧洲形成了与其他世纪明显不同的普遍风气:任何其他学科,唯有运用科学的方法才令人信服。正如赫尔姆霍茨所说:“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

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的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一切都是本世纪与以前几个世纪不同的地方”^[8]。不仅如此,19世纪的许多人还以借助理性思维和科学方法,建立一门科学并相应有一整套严密的概念、定理、范式予以支持,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事,为此,人们称这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时代”^[9]。恩格斯也对当时的这种现实深有感触地说:“在当时人们是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就不配生活在19世纪”^[10]。

不管是在理论观念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当中,西方文学中的所谓“写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历史过程之中的(Erich Auerbach 3-23)^[11]。正是上述这种区别于以前世纪的精神文化风气,影响着文学的发展,熏陶出了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一批写实主义倾向的作家,形成了新的“写实”观念。巴尔扎克就是用动物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正是动物学的“统一图案说”帮助他构建了《人间喜剧》的社会结构图,正是科学思维启发他把文学创作看成研究社会与历史的写实主义理念。左拉几乎在相同的文化思想路线上追随着巴尔扎克且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福楼拜则借用医学科学的方法,更冷静细致地解剖人的心灵。其他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实主义大师,尽管不像巴尔扎克、左拉和福楼拜那样直接运用自然科学进行文学创作,但他们创作中的写实原则,无不与科学理性精神血脉相联。

也许读者要问:你这里讲的科学、理性对现实主义的影响,不过是在创作方法、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观上的影响而已,这些都是艺术理念上的问题,而不属于人文观念上的事。其实不然。且不说艺术理念原本就要影响文学创作中的人文观念的表达,就是艺术理念本身,也是由作家的人文观念和人文追求决定的。或者说也可以说,正由于现实主义作家有一种延续自启蒙理性的人文观念,才会接纳科学的方法与观念去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接纳了科学方法,现实主义文学才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实”“写实”理念;正是这种“真实”“写实”理念,才会有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灵魂的空前真实、细致的剖析,才会出现与浪漫主义文学不同的人文观念。如果说源自启蒙哲学之先验理性,重灵感与感性的浪漫主义文学理念对“人”的形象的塑造起一种扩张与外现作用的话,那么,源自启蒙哲学之经验理性,重分析与理智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对“人”的形象的塑造起一种收缩与内敛的作用,而这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人文观念的表述和人性抒写的方式。

由此可见,科学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更深层次上,正是它在驱逐了上帝之后带来的人文震撼。

三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哲学家尼采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惊呼:“上帝死了!”这一声惊呼告诉人们: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崩毁了。那么,上帝是怎么“死”去的?他的“死”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虽然并不反对上帝,但他们以人的感性抗拒上帝对人性的压抑,以人智向上帝索要人的独立性。他们在向上帝标示自身价值与意义时,就意味着人同上帝开始疏离。到了17世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实际上是用人的智性能力向上帝标示人的强大,认为人自己就有上帝一般的智慧,因而可以知道上帝才能知道的事——世界的奥秘,这种理念推动了科学的快速发展。18世纪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人的信心,也增强了对上帝的傲慢,人们开始以科学为武器攻击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一种没有人格化上帝存在的新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开始形成。再到19世纪,科学走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它不仅给人类创造了极大的财富,导致人们对它的热烈追求,更重要的是,科学使人们确立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人们认为有了科学,人可以做一切上帝能做的事,人们把科学当作上帝来崇拜,实际上,科学成了上帝,人也就走到了上帝的位置上,

人把上帝给驱逐了。或者说,在人类不再需要上帝之后,上帝也撒手而走了。所以,如果说“上帝死了”的话,那也正如尼采所说的:他是被人杀死的!而且,尽管尼采在19世纪末报告了上帝之死的信息,这不是一种预告,而是一种对“已死”之实的报告。19世纪就已经是一个上帝退隐的时代。

就这样,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几百年里,西方的所有世俗学说,几乎都在竭尽能事驱赶上帝,改变人与上帝的关系,正如鲍姆所描绘的那样:

从宗教改革以来到现在为止的上帝观念史,宛如一份地震仪的记录,所记录的是许多诞生、死亡,以及一次大震撼的事迹。在这段时期,人们把那么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大震撼上,竟至很容易忘掉欧洲所具有的创生新神的能力,或赋予上帝新特征的能力,或必要时把旧特征重新加以组合的能力。上述的新神,包括十八世纪自然神论“缺席者”式的神。十九世纪内在演化式的神。这两种神大大不同于“正统的”、超越而全能的上帝。不过,记录在地震仪上最引起纷扰的是宗教大动乱,还是较近的所谓“上帝之死”。尼采所预言的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个神的死亡,而是意味着所有神祇的死亡。这件事情代表着欧洲思想朝着宗教的怀疑主义与宗教的无所谓心态发展之趋向,这趋向从十七世纪以来就很强烈,后来更是加速发展。这个趋向的最终产物在今天仍具体可见,就是西方文明世界有史以来最世俗化的社会^[12]。

这里所说的“最世俗化的社会”,就是上帝退隐的社会,这个社会从19世纪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

上帝退隐了,西方人实现了多少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然而,上帝退隐了,魔鬼却肆无忌惮了。这是人的灾难,这是人类文明的悖谬。

人在自然属性上是感性的动物,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才成了理性的动物,然而,人的动物性一面原始欲望依然存在,它会导致人自私、贪婪、好斗等劣根性。因此,进入文明社会后的人,必须凭借自己创造的文明,如国家权力、世俗道德、宗教规范等等,来约束原始本能,以维持正常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宗教在道德的意义上起到了国家权力和世俗道德规范所起不到的作用。上帝设置的天堂与地狱的境界,其实是道德上给所有俗世平民与权贵、弱者与强者、贫民与富人平等的道德天平,因为在上帝面前,谁也逃脱不了末日的审判,贪婪自私者无论在俗世处于什么位置,都只能因自己的罪恶而进不了天堂。因此,上帝的存在,对世俗的人来说,无疑从道德的角度扼制贪欲的膨胀,扼制邪恶的滋长,也就制止了魔鬼的横行。“在上帝之光的普照下,人人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末日审判时,谁进天堂,谁进地狱,一切均取决于人们自身的善恶行为。身后的归宿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权贵们为了身后的理想去处,不得不对自己的贪婪之心有所收敛”^{[13]150}。所以,“上帝的意义,在于人的有限性,在于人需要爱护、怜悯和救赎,在于人的灵魂在爱与恨、贪婪与满足之间需要平衡,受伤的心需要慰藉和温暖。上帝是一种光,一分温暖,一线希望,一块精神馅饼”^{[13]132}。而上帝退隐之后,就意味着他设置的天堂和地狱都不存在了,宗教道德不再对人的善恶起规范作用,对处于19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个性自由、自由竞争,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创造了出空前的西方物质文明”^[14],但是,“自由竞争”原则的道德光环摧毁的恰恰是传统的道德原则。一个在道德领域里上帝退隐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恶欲横行的时代。这就是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是一个上帝远离人世的时代!这个一向来靠天堂、地狱、上帝等制约人的行为、扼制人的恶欲冲动的西方社会,一旦既有的道德规约逐渐丧失,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是一个“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的社会。

在此,我们要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启蒙运动昌明了人的理性,繁荣了科学,激活了人的个性,改变了社会结构,这无疑文明的进步,然而,当科学在思想领域里动摇了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时,当激活了的个性为了个体生存而无视上帝的规约时,当科学给人以力量和自信进而成了人们崇拜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又对世俗中的人在道德上无动于衷也无能为力时,人到底是趋善还是趋恶的呢?人们还应该一个劲儿地倡导个性自由与解放吗?这大致上也可以说是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普遍关注与忧虑的问题。现实主义作家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描写人性中的恶,并借此守护着人的

心灵的纯洁,追寻着使人性完善和趋善的方法与途径的。请看:

19世纪中叶,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确实创造出了若干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构成了“现实主义”勃兴的繁荣局面,“巴尔扎克通过给新兴城市和初期的资本主义动力以及猖獗的个人崇拜赋予形式,‘发明了’十九世纪”^[15]。他们的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把新生的资本力量、灵魂的统治者——金钱作为他伟大史诗的主人公”^[16]。他警告人们,恶欲和利己主义已成为这个世界的动力。他的小说,展示了人类善良天性是如何在金钱的诱惑下向地狱沉落的。《人间喜剧》为人们展示的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人被异化的历史悲剧,巴尔扎克也由此探索着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的普遍性问题,他借小说抒写了自己为人类的善良天性的失落而发的满腔忧情,表达了他对人类本体之哲学思考。他还借《高老头》中高老头之口发出了“这个世界不是要灭亡了吗”的惊呼。

萨克雷热衷于揭露身居高位的人的丑恶,展示金钱对人的心灵的侵蚀。“他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早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倾向于对人类的邪恶进行自负的说教”^[17]。

福楼拜在他的小说中揭示了情欲正如“魔鬼”一样潜伏于人的灵魂深处,人的行动不可抗拒地受其控制。在他看来,人们生活的世界是由“魔鬼”操纵的,而这个“魔鬼”就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它时时诱惑着人们,并把他们引入毁灭的深渊。《包法利夫人》把爱玛的堕落与她自身难以自制的欲望冲动联系起来,她不断地走向死亡。欲望燃烧了她的生命,欲望也毁灭了她的生命,“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18]。福楼拜用27年时间写成了剧本《圣安东的诱惑》,以梦幻的手法描写中世纪圣洁的隐士圣安东与魔鬼的诱惑做斗争的故事。魔鬼引诱圣安东进入“梦幻之乡”,经受灵与肉的煎熬之苦,展示了人的潜意识深处“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作者借此进一步证明了无法抗拒的“魔鬼”在人身上存在的事实,他也因此产生了对世界的悲哀与厌恶。

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了俄国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人的心灵状况。他通过对人类做反复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恶本能。托尔斯泰从对自我灵魂的解剖扩展到对人类本性之善与恶的研究,再转向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标明他对人类的研究与把握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文学那种注重人的外部获得的研究转向人自身的研究,这是对人的认识上的深化与现代化。他在对人自身的研究中发现了人身上隐藏着不可抗拒的情欲和邪恶本能,也即他所说的人身上存在着“动物的人”。这一发现首先是在他自己身上完成的。“托尔斯泰做感苦恼的还是他情欲和堕落的行为”^{[19]60}，“这种情欲是人之常情”^{[19]91}。由此他又发现这种情欲是整个人类天性中的恶的本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托尔斯泰那样目睹并感受发自尘世的情欲”^{[20]456}。在他看来,人本身的邪恶和情欲,是孳生社会罪恶的根源。聂赫留朵夫身上的“动物的人”造成了玛丝洛娃的悲剧,安娜的“堕落”也和她自身的情欲有关。既然如此,那么,“为了改变世界秩序,必须改变人”^{[20]464}。在尚存有人文主义理性文化的托尔斯泰看来,这种改变是有可能的,因为,人身上除了“动物的人”之外,还要有“精神的人”,即理性的人。所以,他时时期待着、梦想着“内心革命”、“灵魂革命”的发生。聂赫留朵夫的“复活”便是通过自身的善克服恶、理性战胜情欲的“灵魂革命”的实例。托尔斯泰似乎通过聂赫留朵夫证明了人像浮士德那样永远不会坠入地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处于对人类天性之恶的无休止的发掘之中,他告诉人们:“恶在人身上隐藏着得要比那些社会主义者兼医生所估计的要深得多,在任何制度下也避免不了恶,人的灵魂永远是那个样,反常现象和罪孽主要来自灵魂本身”^[21]。他的小说告诉人们,由于人自身存在着永恒之恶,因而人永远成不了人文主义者想象的“巨人”,而是“虱子”。

……

不必再多列举了,现实主义作家似乎个个都像有“嗜恶癖”,以展示人之恶为快。其实不然。确实,他们不像浪漫主义者那一味地张扬个性自由,也较少直接抒写人性美的颂歌,而更多的是披露人性之恶。因为,在他们看来,在上帝不管人类道德事务的时代,个性的自由将会激活人的恶欲,19世纪的欧洲现实已然如此。然而,他们披露恶是为了消除恶进而保持天然人性之善与美,因而在人性之善的根本追求上,他

们与浪漫主义者愿望一致。然而,恰恰是现实主义作家的这种“嗜恶癖”,使他们的小说空前深入、全面地展示了那个上帝退隐时代的人性之真实状况,他们的创作也成了拥有警世意义“文学经典”。

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以真实而深度的社会观察与人性剖析,展示了上帝缺位、金钱主宰的社会中人的心灵的千姿百态。他们描写了金钱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的破坏力,对此,他们深感忧虑,在这种忧虑的背后,隐含了他们对人性之善的坚守与期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当时乃至今天的人们发出了警告:物欲诱发的贪婪,将把人送入地狱——“自己成为自己的地狱”。在此,笔者特别要引用18世纪爱尔兰文学史、思想史学者伯克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以进一步引证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深度人性抒写的经典意义:

人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的枷锁;取决于他们对正义之爱是否胜过他们的贪婪;取决于他们正常周全的判断力是否胜过他们的虚荣和放肆;取决于他们要听的智者和仁者的忠告而不是奸佞的谄媚。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的约束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越强。事物命定的性质就是如此,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22]。

参考文献:

- [1]叶·梅列斯金. 神话的诗学[M]. 魏庆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
- [2]埃利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欧阳谦,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 [3]埃凯. 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M]. 张信,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76.
- [4]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三联书店,2014:287-288.
- [5]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 世界文明史:第三卷[M]. 罗经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8.
- [6]汤浅光朝. 科学文化史年表[M]. 张利华,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70-99.
- [7]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 李珩,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62.
- [8]HELMHOLTZ H. Popular Lecture on Scientific Subjects[M]. London:Longmans Green,1996:33.
- [9]阿金. 思想体系的时代[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2.
- [10]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
- [11]MIMESIS A.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M].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3-23.
- [12]鲍姆. 西方近代思想史[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122.
- [13]启良. 西方文化概论[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 [14]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三联书店,2014:229.
- [15]BROOKS P. Realist Vision[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22.
- [16]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M]. 刘半九,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
- [17]ROBERT J G.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40.
- [18]拜伦. 曼弗雷德[M]. 刘让言,译. 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56.
- [19]亚·托尔斯泰娅. 父亲[M]. 启篁,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20]斯蒂芬·茨威. 作为宗教和社会思想家的托尔斯泰[M]// 陈燊. 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21]米·赫拉普钦科. 艺术家托尔斯泰[M]. 刘逢祺,张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95.
- [22]陆建德. 破碎思想的残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5.



(责任编辑 杨文欢)